



双塔

新时代 新建树 新表达

——山西生态文学创作综述

李盘石

章。山西生态文学以表现人与万物和谐之美为本，笔触深入到生态生活的细节，建构了生态多样性的新的对象描述、新的内容呈现。

探索生态人文表达，凸显生态文化的当代构建。人类历史是一部社会生态的历史，也是一部自然生态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纠缠的自然人文的历史。

张锐锋的《雨中汾源》，赵树义的《茶经》《极光》《丹霞》，以一种生态文化散文的形式，选择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生态先行人物和自然生态人文历史遗迹，在久远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维度里，铺开自然生态叙事和人文历史书写，构筑一种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融合的生态人文叙事，显示了古老自然生态智慧的源流。山西生态文学注重探索和发掘自然生态的人文历史和现实生态的心灵治愈，以文学的视角切入传统的人文历史，从而给现实世界提供了一种生态人文意义上的现代借鉴。

审美追求的新变化

生态文学作品的书写，注重思想审美的提升。山西生态文学作为体现自觉生态意识和自觉生态责任的文学，无疑也自觉注重现代思想的创新和现代理念的表现。过去，中国人祖辈铭记的是人类代际相传的人类伦理关系问题，而今，现代人不仅考虑人类代际相传的人伦关系，而且考虑物类代际相传的自然伦理关系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囊括自然生物繁衍发展的问题，其实也囊括人类繁衍发展的问题。这样的思想理念，本身具有思想审美的力量。在山西生态文学创作里，鲁顺民的生态报告文学、李景平的生态纪实散文、侯良学的生态诗歌、申文军的生态评论，显出现代生态思想理念的真诚阐释和创新表现。

生态文学故事的表现，讲究叙述视角的选择。山西生态文学故事的叙述和生态楷模人物的塑造，

注重表现视角的选择，同一题材作品因表现方式的不同，展现不同魅力。一样写植树将军张连印的故事，鲁顺民的《将军和他的树》写张连印，选择直面人物，直接采访，以一个“老汉”的视角切入，写出一位“将军老汉”的形象。闫学温的《白羊地的将军绿》写张连印，侧面追访、侧面书写，以少年探寻将军足迹的视角，写他人人口中的将军植树故事，写少年追寻“时代楷模”的故事。不同的视角，带来不同的创造，也带来不同的审美，文学视角的选择给生态文学带来新的样貌。

生态文学抒写的对象，指向万物世界的呈现。在传统文学里，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的主体。在生态文学里，文学是人与自然之学，自然万物是生态文学的主体。史峰写他的跑马梁的黄花、跑马梁的荒芜，一样写了跑马梁的种树、跑马梁的绿荫，写跑马梁上植树人的艰险与苦斗。玄武写花花草草写动物写人，写出了花草、动物、人之美，也写出了花草、动物、人之性，写出动物的物性灵性和人的物性人性。应该说，写人性可以使文学深刻，写物性更可以使文学深刻。山西生态文学在人与万物的现代关系上，已经有了新的尝试，也有了别样的开拓，但依然尚待深挖深掘。

生态文学语言的构建，追求艺术呈现的魅力。山西生态文学作家对文学表达和书写，渐渐立起一种自为风景的语言地标。黄凤的语言，平地起风，生猛跳动，意象奇崛，别开一面。鲁顺民的叙述，方言新用，别出心裁，平实见奇，独具魅力。玄武的写实，古朴劲健，气势勃然，落字生响，独言心声。蒋殊的文字，温婉刚劲，气韵饱满，语感含情，文气独到。生态文学的美其实不独在自然生态上，生态文学的美还在或者更在语言上。

生态文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载体，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主流样本。相信在创作组织、引导和支持上总体发力，山西生态文学会走向新的高地。

当鹤鸟飞过少年心田

——从《鹤鸟小子》看儿童文学的生态力量

邢龙

正是这样一部值得关注的生态儿童文学作品。它以少年田埂的成长为线索，在山西娘子关的真实山水间，展开了一场关于守护、觉醒与生命联结的叙事。

读这本书，能感觉到梁芳简洁有力的文字背后藏着一份“野心”——篇章之间穿插的“鹤鸟笔记”，有沉静优美的自然观察；《史记》《穆旦诗集》《格林童话》的点缀，悄悄托着审美教育；现实中的老党员、年轻的书记，成了榜样力量；问题少年的家庭与自身，慢慢蜕变；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太行一号公路，又把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带进故事。所有这些，都融入一名少年的成长故事里。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的一个亮点在于：自然不再是需要保护的客体，而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启蒙者，直接参与了少年的成长。“鹤鸟小子”显然是一个绝佳的书名，它将“鹤鸟”的意象与少年的成长融为一体，实际上，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在许多传统生态儿童文学中，自然往往扮演两种角色：要么是等待人类保护的“弱者”（如濒危动物），要么是抚慰人类心灵的“背景”（如自然风光）。在这两种叙事里，自然本质上仍是被人定义的客体。而《鹤鸟小子》的不同之处在于：黑鹳不仅仅是田埂保护的客体，更是主动塑造他成长的力量。是鹤鸟的出现，让这位迷茫的少年找到了生活的支点；是观察鹤鸟的过程，让他学会了专注、耐心与责任。自然在这里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是与少年展开了一场双向的精神对话。

另一个亮点在于：将外部环境的修复与少年内心的

成长同步呈现，形成一种“内外生态同构”。书中在“关闭的‘火山灰’工厂”一章中，用大量文字描写了生态环境在过去时代所遭受的破坏，和如今鹤鸟的回归、生态的恢复形成对比。生态在改善，少年也在成长。田埂的“心理生态”与家乡的“自然生态”一样，经历了“污染—治理—复苏”的过程，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呼应。

“鹤鸟笔记”是本书在形式上的独特贡献。这些“鹤鸟笔记”，以第一人称记录了主人公对黑鹳的细致观察。这些文本其实颇有传统文学的风格，读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性的附录，但它们又成为《鹤鸟小子》叙事的有机构成——可以看到，笔记中“我”的情绪与小说的故事发展隐隐呼应。在这样的叙事中，“鹤鸟笔记”完成了双重任务：一是科学的、自然的启蒙——它教会小读者如何用严谨的态度去观察自然、记录生命。二是情感的关联——笔记是“我”与鹤鸟对话的记录，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专注、好奇与牵挂。这两者的结合，恰好回应了生态教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让孩子在保持对自然的科学认知的同时，又不失去对生命的文学的、审美的共情。《鹤鸟小子》通过“笔记”这一形式，给出巧妙的答案。

《鹤鸟小子》的价值，不光是讲了一名少年与鹤鸟的温暖故事，更示范了儿童文学可以成为生态文学一种很有力量的表达形式。让读者在凝视一名少年成长的同时，也重新打量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的关系。

当少年仰望鹤鸟飞过天空的那一刻，他看见的不仅是一种珍稀鸟类，更是一个值得为之努力的世界。

生态文学的高度

黄亮斌

折性、全局性变化。这是中国生态文学方兴未艾的基础，为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宝藏。中央环保督察、污染防治攻坚战、生物多样性保护，每一场战役都蕴含着深刻动人的故事。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需要作家在创作中有着深刻的洞见。中国生态文学进步的空间仍然很大，如何当好时代变迁的记录者、人民奋斗的讴歌者、文化自信的彰显者与人类进步的推动者，仍需不懈努力。

中国生态文学的高度乃至经典的形成，一定是自然生态领域的科学家、作家和出版界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的结果。

一是要清醒认识将生态文化体系列为生态环境治理五大体系之首的意义并认真践行。生态文明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最终的表现形态并非只是建成一个个污染防治的工程措施，而是以生态文学经典作为具象，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精神状态。

二是生态文学经典的创作主体多为科学家。当代多数生态文学作家人文强、生态体弱，作家们要研究生态系统、物种关系、污染机理，做好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现者，才能做好自然生态的书写者。

诗意生态 别样叙事

《一泓清水入黄河》创作谈

景平



《一泓清水入黄河》书影

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愿望。作为山西的母亲河，“汾水长流”也一直是山西人民的愿望。当这样一种愿望终于变成现实的时候，作为一名生态文学写作者，感觉有一种激情、一种责任，欲要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和它们的演变故事记录下来、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部长篇生态报告文学《一泓清水入黄河》（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汾河治理发生了渐进式的变化：汾河逐渐退出污染恶劣的黑臭水体。这是山西人民有目共睹的。2023年，山西举行“一泓清水入黄河”工程开工仪式。一项在黄河流域山西河段上启动的“头号工程”也是生态工程、发展工程、民生工程全面铺开。2025年，汾河彻底告别了污染水体，回归了碧水长流的优良水体。

《一泓清水入黄河》写的就是汾河长流、黄河变清的故事。作品在文学构思上，突出了一种“飞鸟式”的生态结构：“一泓清水入黄河”是飞鸟的灵魂，“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是飞鸟的躯体，“江河引”“由远而来的汾河”“汾河的丢失”是飞鸟的左翼，“汾河的向往”“由近而远的河汾”“水永远”是飞鸟的右翼。以“汾河九章”的方式，构建起回溯历史、聚焦当代、兆示未来的框架。

回望历史。在生态意义上，汾河、黄河是从自然变迁里流淌而来的，汾河其实比黄河的成河历史，还要早而且早得多。在社会意义上，汾河、黄河是从人类斗争里流淌而来的，人类的历史是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也是人类自相争斗的历史。在人文意义上，汾河、黄河又是从诗词歌赋里流淌而来的，人文的河流，实际上寄托的是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的人类理想。

聚焦当代。汾河所有的生态环境破坏，历史性叠加聚集到当代，就导致汾河“无水不污，有河必干”。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河流危机到被称为“河流死去”，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把拯救河流当作拯救自己，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投入巨资给河流“生态补水”，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牺牲经济增长拒绝污染，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将河流建设成为了长长的河流公园。

兆示未来。汾河的治理修复，不只是汾河的治理修复，是山西所有河流的治理修复，是整个山西生态环境的治理修复。而治理修复的根本，在于生态环境保护，在于绿色转型发展，在于生态文明建设，在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在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绝不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

在这样一种“飞鸟式”结构里，其内在逻辑在于，意欲以飞鸟左翼式的回望历史，以飞鸟躯体式的聚焦当代，以飞鸟右翼式的兆示未来，构架一个文学审美和哲学认知的整体，从而突出一个宏阔博大的主题：人类与自然斗争、人与人斗争的历史，只有在生态拯救和自我拯救的涅槃与重生里到达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再造，人类才会走得更远。

显然，“一泓清水入黄河”，关乎人与世界，关乎人与未来。而生态文学的责任和使命，也关乎人类与世界，也关乎人类与未来。生态文学在实质上，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历史的生态反思、现实的生态透视、现代的生态审美、超前的生态理想，反映和建设人与自然新型关系，传播和建树生态文明新型价值，塑造和建筑生态文化新型形态，推动并建构自然生态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生态文学内涵如此，却外延广阔、视域广阔。我的生态文学视角和焦点，始终对准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场景和历史背景。我经历了生态环境的恶劣时代、环境保护的鏖战时代、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时代，我知道生态文学遭遇了什么。因而我的生态文学创作，也经历了自然生态写作的自发时代、生态环境抒写的自觉时代、生态环境创作的自信自豪时代。

就像在环境污染时代曾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反思和批判生态环境破坏的历史问题一样，在生态环境改善时代，我依然无所顾忌大张旗鼓反映和高扬生态环境质量的现实改善。我以彰显和高扬生态环境的现实改善，回答曾经提出的生态环境的历史问题。反思与再现、批判与彰显、鞭挞与高扬，它们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双翼，如此，生态文学方可以飞翔起来。



《鹤鸟小子》插图

毋庸置疑，儿童文学如今已经成为生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童年与自然、非功利的天然联系，更因为儿童文学独特的文本属性——优秀的儿童文学，能够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样宏大的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故事，让生态理念不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融入成长的肌理。

梁芳的《鹤鸟小子》（希望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相关链接——

5月22日，由生态环境部组织开展的“2025生态文明建设年度人物”宣传选树活动结果揭晓，本文作者、山西生态环境作家李景平成为全国10位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之一。

